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德] 迈尔 Heinrich Meier ● 著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 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

Die Lehre Carl Schmitts und das Thema von Leo Strauss

林国基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

Die Lehre Carl Schmitts und das Thema von Leo Strauss

[德] 迈尔 Heinrich Meier ● 著

林国基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命题/(德)迈尔著;林国基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9

ISBN 7-5080-3569-0

I. 古… II. ①迈… ②林… III. ①施米特-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②施特劳斯-神学-思想-研究 IV. B51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300 号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Heinrich Meier, *Die Lehre Carl Schmitts* published by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1994.

Das theologisch-politische Problem zum Thema von Leo Strauss Copyright © Heinrich Meier, 2003.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

[德]Heinrich Meier 著

责任编辑:陈希米

装帧设计:闫志杰 刘佳景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70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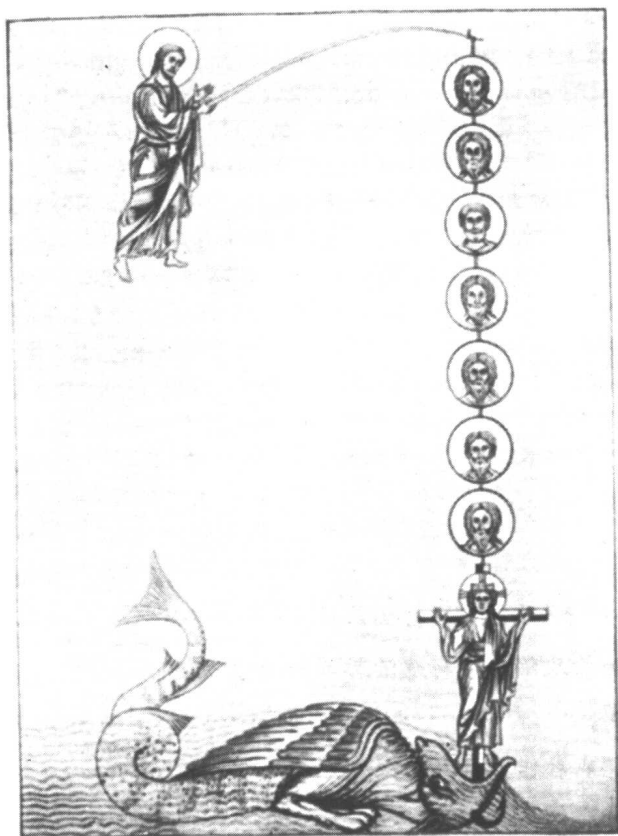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

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上图:海中怪兽(利维坦)被上帝的鱼钩钩中,耶稣和基督的胸像是诱饵。(选自 12 世纪末 Herrad von Landsberg 的《极乐园》)

下图:利维坦。(施米特的著作《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封面和最后一页上的插图)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本书系迈尔教授两本著作的合刊——《施米特的学说》出版于1998年,是迈尔迄今发表的论著中篇幅最长的;《施特劳斯的论题》今年刚刚出版,原题为 *Das theologisch – politische Problem* (神学—政治问题),经作者同意改为现题。后一本书篇幅太小,中译本不便单行,征得作者同意将两书合刊。

迈尔的《隐秘的对话》中译本亦是多篇论述的合刊——作者喜欢篇幅短小的论著,主题都围绕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本书不妨看作《隐秘的对话》续篇,虽为两书合刊,主题同样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问题——实质性表达就是“神学—政治问题”。

迈尔教授提议将两书合刊的这个中译本命名为“神学—政治问题”,就汉语学界的语境来说,不如叫“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权且算作 *das theologisch – politische Problem* 的意译。

施特劳斯的讲演稿《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是我建议作者收进本书作为附录的,特此说明。《施米特的学说》中有不少拉丁文句子和短语,承四川大学哲学系熊林博士帮忙逐译,好些大段法文引文及短语和一些德文的疑难短语,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刘锋兄帮忙逐译;肖丛子博士帮忙翻译了两个部分的“前言”和“引言”并校订了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仅此一并致谢。

2003年7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当第十个月停在天庭
世上便出现了奇迹。
迈亚生下了一个孩子，满是狡黠和魅惑，
赫耳墨斯偷了牛群，带来了梦。
他窥守着夜，看着大门，
很快，他要在永生的神们之中展示奇迹。

—— 荷马《献给赫耳墨斯的颂诗》，11-16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1
第一部分 施米特的学说(林国基译)	1
——四论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	
前言	3
一 道德或者作为自身问题的形象	4
二 政治或何谓真理?	30
三 启示或者谁不赞同我就是反对我	72
四 历史或者基督教的爱培美修斯	133
第二部分 施特劳斯的论题	191
引言	194
施特劳斯思想中的神学—政治问题(刘平译)	196
论启示信仰的谱系(朱雁冰译)	224
死亡即上帝(朱雁冰译)	239
附录	
施特劳斯 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林国荣译)	247

第一部分

施米特的学说

——四论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

献给政治哲人和我敬重的友人
克罗泊西(Joseph Cropsey)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章,结束了我在《隐秘的对话》(译按:中译本见华夏版 2002)一书开始的论析,两书不可分割,它们审理的是一件事情,受同一个意图引导。反驳—论证的品格(der elenktisch - protreptische Charakter)将这两部论著连接起来,用心的读者不大会忽略由这一品格引出的两部论著的差异。本书整个来说是报告我研究施米特政治的神学所得出的若干结果。在我看来研究施米特政治的神学日显重要的东西,以及我着意要说的东西,已经包含在这部和前一部书中了。

迈尔(Heinrich Meier)

1993 年 9 月 20 日於慕尼黑

一、道德或者作为自身问题的形象

敌人乃是作为人的我们自身的问题

而敌人会将我们,我们也会将敌人逼进自己的死角。

丢伯勒《帕勒莫之歌》

道德义愤不是政治哲学的事情,与政治哲学没有关系。但道德义愤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且仅在如下情形下才与哲学相关,即哲学得在它面前为自身辩护。对于哲学而言,如果道德并非是个不可质疑的前提或者不能质疑的给定性,而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对象或者一个问题,那么道德就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为探测的指针,对于道德义愤的首要目标和最终根源的追问能够发展出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那些对“企图超越道德”的道德追问。^①任何致力于施米特及其学说研究的人,最好将这两个问题并提,不忽视任何一个问题。

面对一个将“严酷的道德决断视为其政治理念的核心”且视道德和政治与神学荣辱与共的理论家,怎么可能对尼采的警言置之不理?^②如果没有攥紧阿里阿德尼线团——对这个政治神学家的义愤的基本对象的问讯能将这一阿里阿德尼线团抓在手中——怎么可能成功地找寻到穿行于这一充满历史激变、政治风浪、有意误导以及不自觉的晦暗的迷宫并进入其中心的著述的路径呢?

然而,施米特不是自诩为一个“纯粹政治的理论家”吗?或者,即使并非如此,至少也是个“其政治思想前后一致”的“政治现象的观察

^① 尼采,《善恶的彼岸》,格言 6;参格言 19 和 211。

^② 《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慕尼黑,莱比锡,1922 年,页 56 (修订第二版,1934,页 83);参页 55(82)。

者”？^① 像一些人所认为的，他不是以严格区分政治与道德——或者像另外一些人所说的——完全割裂政治与道德而著称？与施米特对“人文主义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这种“道德主义”的否弃相一致，这种名声不是最为持久地占据着和主宰着朋友和敌人的心灵吗？在很多人眼中这种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冷酷的无畏和令人神往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源于此吗？这不同样是一种以更大规模向他袭来的道德义愤吗？

任何试图在关于施米特的偏见中寻找其意向的人，只会身陷一团迷雾，从而肆无忌惮地遮蔽施米特自身的迷宫，无缘登堂入室哪怕半步。崇拜能显明有关崇拜者的信息，义愤则能揭示出很多有关义愤者的情形。然而，关于崇拜和义愤的对象判断，也有可能发生失误，从而阻碍而不是启明通向最为重要者的路径。难道“纯粹的政治”的宣称不会是一种修辞、政治和道德的分离不会是某种策略的一部分，即归根结底它们不是同样以某种“严酷的道德决断”为其基础吗？如果施米特对“人文主义道德”以及“道德主义”的攻击恰好受制于一种道德动机，那又该如何解释？

最后，如果对施米特曾经试图超越的道德问题的追问仍然是一种能够显明事实且能增加我们的知识的有意义的问题，那么这种追问在有关施米特本人的那些宣称面前就应该止步不前并保持沉默吗？

让我们紧握阿里阿德尼线团的最远端，并且首先观察那些最先由施米特系统勾画出来的对于时代的道德画卷的批判。为此，我们需要依据施米特的权威，正是他请求我们时刻关注来自某种作品(oeuvre)、学说和政治—神学决断的历史挑战。一战期间他这样写道：

像那些怀有邪恶良知的事物一样，这个时代以谈论其问题性为乐，直到良知的激荡泯灭下去并自得其乐为止，据说这至少是有趣的。这个时代自诩为资本主义、机械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交通、技术和管理的时代。实际上，“商业”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商标，成为达到任何可悲或者无意义的目标运

① 《政治的概念》，第一版，页 26（编入“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第 58 卷，H。1927 年 9 月 1 日）；第二版，页 67[《政治的概念：兼论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时代》，慕尼黑/莱比锡，1932；对于第二版的引文将根据第一版给出，而页码将参考新版《政治的概念》（兼有一个导言和三个附录的 1932 年的文本），柏林，1963 年，以使读者更容易找到有关的段落出处]。有关《政治的概念》的不同版本的文献目录，可参拙著《隐匿的对话》，斯图加特，1988 年，页 14—15。

转良好的手段,手段相对于目的的普遍迫切性,商业抹杀了个体的存在,以至于个体甚至不再能觉察自身被抹杀,故此他也不再依赖某种理念,至多依赖某些陈辞滥调,而且总试图确保所有的事情都运转平稳,避免没有必要的摩擦。由通常的手段性和可计算性发展出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成就是如此令人惊异。人变成了贫乏的怪物,“他们无所不知,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理解一切;他们的学者在历史中、在自然中、在他们自身的心灵中留下探索的印痕。他们是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他们撰写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著作。如果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某种敏锐和灵巧的分析以及合乎目标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以排除那些不便。即便这个时代的穷困者,那些像影子一般一瘸一拐地劳作着的大批的不幸者,以及那些成千上万渴求自由的人,证明其自身只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物,即将所有的一切简化为其意识的公式,否弃任何形式的奥秘和灵魂的欢悦。他们指望在地上建立天堂,由工商业成就的天堂,而且事实上据说这个天堂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在柏林,在巴黎或者在纽约,这个天堂配备有游泳池、小汽车和俱乐部的椅子,时刻表似乎成了他们的圣经。他们不需要爱和恩典的上帝。他们已经“制造”了如此多的奇迹,他们为何不能“制造”出一个人间天国的通天塔呢?的确,那些最重要的和最终的事物已经世俗化了。正义为权力取代,诚信退化为可计算性,真理蜕变为被普遍认可的正确,好的趣味取代了美,基督教成为一种和平组织。价值的普遍混淆和伪造品统治了人们的心灵。利弊的精确权衡代替了善恶的区分。诸如此类的混乱令人惊恐。^①

这幅图画——1916年施米特试图以此表达“时代的道德含义”^②——汇集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对象,施米特终其一生充满义愤和

① 参施米特,《丢伯勒的〈北极光〉:关于这一作品的要素,精神和现实性的三项研究》,慕尼黑,1916年,页63-65。

② 参施米特的《丢伯勒的〈北极光〉》,同上,页68。

厌恶地与这些对象作过斗争,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从远处辨识出这幅图画:世界成了一个大工厂,成了一个空洞地运转着的机器,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就这样永无休止地运转着,像一出精心策划的戏剧,方方面面调停、均衡、完美无缺,有趣是自然的了,却缺乏伟大,缺乏充实,缺乏意义,处于一种疲软状态、忙忙碌碌的无聊状态和每完没了的争论状态,缺乏所有那种强烈的情感,平庸乏味,没有奥秘,没有魔力。不断扩展的世俗化,信仰的真理的失落,不断增加的无神论,或者如他十年后所说的那样:上帝的无能性。^① 人类的傲慢,他们将其意志的规划和利益的算计置于天意的位置,他们误以为能够强行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在那里,他们似乎免除了善恶的决断,并一劳永逸地从中驱除了紧急状态。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世俗的时代”,^② 它迫使施米特倾其全力与之斗争。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它都是企图为这样一个时代开辟道路,并多方尝试将无限制的对于安全的考虑付诸实施。施米特的义愤对于那些沉湎于如下信念的人同样有效,即“世界间的万有纯属人事”。他对同时代的人怀着愤怒之情,因为他们仅仅仰仗所谓“惊人的成就”,这种成就的确是“毋庸置疑”的:“大城市,豪华轮船,以及卫生保健;舒适的消暑胜地从心灵的监禁中诞生”。他们狂妄地指望着准备一切,组织一切,命令一切。如此的世俗化。在这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安排和构想得井井有条。“那个唯一重要的事情除外”。^③

1970年,在其最后独自发表的出版物的后记中,施米特——自其最早的关于时代的批判以来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再一次勾画出一幅轮廓鲜明的“反面画像”,以便“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④ 这在下面的两个句子中表达得更为集中和凝练:“人事变幻如浮云”。“惟人自身能反对人”。

就像1916年一样,如下信念在施米特所勾画的反面画像(Gegenentwurf)中仍处于中心地位,没有发生动摇,即“世界中的一切纯属人的事情”,人们将一切都用来服务于规划——支配的权力,使所有的一切都受人的愿望和要求的支配,人们可以做一切事情。通过勾

① 参施米特,《柯特四论》,科隆,1950,页11。

② 参施米特,《丢伯勒的〈北极光〉》,同上,页66。

③ 同上书,页67,69,77。

④ 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的神学的传说》,柏林,1970年,页124。